

理论经纬

论儒家文化的精神源型

——从礼乐制度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创造性转化

■王平¹ 宋志刚²

在当代社会对儒家文化的认知中，周公作为关键人物却常常被局限于“周公解梦”“八字解卦”的民俗化符号中，这种片面化的解读不仅遮蔽了周公作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基者的历史本源，也削弱了周公在儒家文化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周公制礼作乐的伟大实践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并通过德治理念与制度创设，为后世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因此，重新审视周公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不仅有助于还原其作为儒家文化“精神源型”的真实面貌，更能够为新时代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重申周公作为儒家文化“精神源型”的历史地位

周公的历史本源。在民间文化的传播中，周公形象常被简化为解梦占卜的符号，严重遮蔽了他作为西周初期卓越政治家、思想家的真实历史面貌。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姬旦作为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在周王朝面临政权更迭与局势动荡的关键时期，以摄政之姿承担起稳定局势、开创文明的历史重任。他亲身经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王朝更替，在武王早逝、成王年幼的危局中，毅然平定“三监之乱”，并在此后通过“制礼作乐”的制度创设与文化构建，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这种从政治实践到文化建构的双重贡献，使其成为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节点。

制礼作乐奠定中华文明的核心框架。周公的“制礼作乐”绝非简单的礼仪规范制定，而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华文明走向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这场变革通过三个维度，构建起中华文明的核心框架。制度化宗法封建：周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起“家国同构”的宗法等级秩序，确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级体系。《礼记·大传》中“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的记载，详细阐述了这一宗法制度的运行逻辑。通过分封制，将政治权力、土地资源与血缘亲疏紧密结合，形成大一统政治格局雏形。这种制度设计不仅解决了西周初期的统治问题，更为后世儒家强调的伦理本位、尊卑有序的社会观念提供了制度基础。理性化宗教伦理：面对殷商时期浓厚的巫觋鬼神文化，周公进行了革命性的思想转变。他在《尚书·康诰》中提出“惟命不于常”“明德慎罚”“用康保民”等观点，将“天命”的归属与统治者的德行紧密关联，强调统治者对百姓的爱护与治理才是获得天命眷顾的关键。从“神本”向“人本”（以德性为本）的思想转向，打破了殷商时期对鬼神的绝对依赖，为儒家“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点。礼乐文明的塑造：周公创立的礼乐制度，以“礼”区分社会等级，规范行为秩序，以“乐”调和情感、促进社会和谐。《礼记·乐记》中“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记载，深刻揭示了礼乐制度内的逻辑。通过祭祀、朝聘、婚丧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礼乐规范，周公将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行为准则，实现了外在约束与内在情感陶冶的有机统一，塑造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气象，成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直接源头。

儒家思想的直接源头活水。孔子一生以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勉，其思想深受周公礼乐文明的影响。“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感慨，明确表达了孔子对周公及其开创的礼乐文明的推崇。从思想内涵来看，儒家思想中的“仁”“礼”“德”“孝悌”“忠信”等核心概念，均可在周公的思想与实践找到根源。例如，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主张，本质上是对周公礼乐制度中道德规范的继承与升华；而“为政以德”的理念，更是直接延续了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甚至发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感叹。周公作为儒家文化“精神源型”的地位当之无愧。

周公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儒家精神的奠基

“敬德保民”是德治理念的初步确立。在周公之前，“德”的概念虽已存在，但周公赋予其全新的政治伦理内涵。通过对殷商灭亡教训的深刻反思，周公在《尚书·蔡仲之命》中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强调天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这种“德”的核心在于“保民”，即统治者要像爱护婴儿一样关爱百姓，使其安居乐业。在《尚书》的诸多篇章中，“保民”“裕民”“康民”“惠民”等思想反复出现，如《康诰》中“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的论述，将百姓的福祉与政权的稳固直接关联。这种思想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学说奠定了基础，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的“仁政”主张，皆是对周公德治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重视民生的理政思想。

秩序建构与教化的核心载体。周公创立的礼乐制度，旨在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它是伦理秩序的制度化体现：周公将家庭伦理（孝悌）、社会伦理（忠信）、政治伦理（尊尊、亲亲、贤贤）融入具体的礼仪规范中。以《仪礼》为例，其中对冠礼、婚礼、丧礼等仪式的详细规定，使抽象的伦理原则具有可操作性 and 约束力，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人际关系模式。这种将伦理道德与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方式，使得社会秩序的维护不仅依赖于法律强制，更通过文化认同与道德自觉得以实现。礼乐制度是教化人心的重要方式：礼乐并非单纯的仪式，其根本在于通过庄严的礼仪、和谐的音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情感与行为。在周代，贵族子弟通过学习礼乐，培养出温文尔雅的气质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普通民众也在参与各种礼仪活动的过程中，接受道德规范的熏陶，实现高雅的社会风尚。这种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方式，成为儒家“礼教”思想的直接源头。礼乐制度有助于维系社会和谐：“礼以别异，乐以和同”的机制，既承认并维护了社会等级差异（防止僭越混乱），又通过“乐”的情感共鸣功能，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认同，化解因“别异”可能产生的紧张对立，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儒家对理想社会形态“大同”“小康”的构想，也为现代社会处理多元利益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忧患意识与理性精神。周公思想中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亲身经历政权更迭的动荡，深知“天命靡常”，政权稳固来之不易。这种忧患并非消极恐惧，而是转化为一种高远的理性自觉和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在《诗经·大雅·大明》中“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的诗句，生动体现了周公要求统治者时刻保持敬

畏谨慎、勤勉修德的态度。同时，他将政权稳固的根基从对鬼神的依赖转向对统治者自身德行和民众福祉的关注，体现了早期的人文理性觉醒。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面向现实、注重人事的理性精神，成为后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世情怀和志于道、责任担当的重要精神底色。

从周公到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孔子的继承与发扬。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以“克己复礼”为毕生追求，致力于恢复周公所确立的礼乐秩序。他对周公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仁”学，将周公强调的统治者之“德”扩展为具有普遍性的伦理核心。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仁”确立为“礼”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基础，如“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的质问，深刻揭示了道德情感与礼仪规范的关系。二是强调“礼”的内化与普及，注重礼仪的内在真诚与敬意。他批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主张礼仪不应流于形式，而应发自内心的认同。同时，通过“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将原本主要面向贵族子弟的礼乐教化，推广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为礼乐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系统阐述德政思想，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将“德政”视为治国理政的根本，进一步发展了周公的德治理念。

孟荀的深化拓展与儒学的制度化。孟子沿着周公“保民”和孔子“仁”的思想脉络，将“民本”思想推向新的高度。荀子更侧重于周公“礼”的秩序建构功能。孟荀分别从内在心性和外在规范两个角度，深化了周公奠定的德礼并重的思想传统，使儒家思想体系更加完备。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服务于国家治理，他传承、深化了儒家思想。至此，周公所开创的德礼文明在国家力量支持下，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特质的核心力量，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

“精神源型”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对周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其“敬德”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保民”思想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礼乐智慧转化为现代社会治理与文明建设的力量，将“和而不同”理念拓展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我们能够激活这一古老“精神源型”的生命力，使其成为涵养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深厚源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精神食粮。

超越符号化认知，汲取历史智慧。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摆脱对周公的符号化认知，回归历史本真。通过深入研读《尚书》《诗经》《周礼》等经典文献，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成果，全面了解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内涵。对《尚书·周书》的细致解读，才能深入把握周公的政治思想。对历史本源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从而增强对自身文化根源的认同与自信。通过对曲阜鲁国故城考古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周公礼乐制度在当时的实践形态；将曲阜周公庙及三孔、三孟等儒家文化符号为代表的景区景点串联，开发出对儒家文化的游览路线和文化探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经营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作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重要任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的战略性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在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上下更大功夫，不断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

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加快打造创新领先、功能突出、治理高效、充满活力的现代新国企。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必须全面落实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引导民营企业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摘自12月1日《人民日报》作者：张玉卓）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持续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十五五”时期，我国扩大内需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要准确把握

握国内市场发展规律，持续扩大内需，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统筹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基础。（摘自11月28日《人民日报》作者：郑栅洁）

源；从而改变当前三孔、三孟景区游客熙熙攘攘，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公庙景区门可罗雀的现象，当地文旅部门（含导游解说词）应正确引导游客，来到曲阜，一定要去周公庙汲取邹鲁文化 and 儒家思想策源的“精神源型”。

激活“精神源型”的现代价值实现创造性转化。“敬德”思想的升华：将周公强调的统治者个人修养之“德”，升华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实践。尤其注重领导干部的“敬德”建设，要求其为政以德、廉洁奉公，这是对“以德配位”思想的现代诠释。在新时代，通过开展党性教育、廉政建设等活动，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价值观，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引领者。依据周公“敬德”的思想，周公庙中的伯禽台、问礼堂等，也应该如孔府、孟府中的棂星门、杏坛、冷板凳、戒贪图等景点一样成为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的现场教学点；这是让领导干部到周公庙汲取邹鲁文化和儒家思想策源的“精神源型”，恰恰是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好场所、好教材。“保民/民本”思想的现代发展：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创造性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共同富裕，这是“保民”“惠民”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发展。在实践中，我国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践行体现。礼乐文明的现代诠释：摒弃传统礼乐制度中维护等级特权的时代局限，挖掘其追求社会和谐、注重教化的普遍价值。将“礼”的精神转化为现代社会文明礼仪、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如在公共场所倡导文明礼貌、在职业领域强调敬业奉献；将“乐”的和同精神融入现代文化建设，通过文艺创作、文化

活动等形式，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与审美情趣。同时，通过赋予传统节日、礼仪时代内涵，如曲阜周公庙可在春节、中秋节等节日与全国各地周公庙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增强文化认同感。

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文化强国建设。周公及儒家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思想，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益启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道德的教化功能，实现良法善治。通过公正司法等环节，弘扬社会正气；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周公礼乐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为处理当今世界不同文明、国家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霸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在国际交往中，我国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一带一路”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展现了“和而不同”文明观的实践价值。借鉴儒家重视教化的传统，将其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对周公思想源流的认知，贯穿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政德教育和社会教育全过程。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开展传统文化课程、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在高等教育阶段，设立相关研究机构，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在政德教育中，将传统文化纳入培训内容，提升干部的文化底蕴和理政能力；在社会教育方面，通过社区文化活动、网络媒体传播等方式，营造全民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者1系民盟山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济宁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作者2系民盟盟员、济宁市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员）

来稿摘要

加快建设数字济宁

■安鲁新 杨静

加快建设数字济宁，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必然选择，是推动济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构建济宁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抓手。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围绕“兴业”，做强数字产业化规模，打造数字经济新动能、新模式。济宁数字产业化规模持续壮大，以此为基础，全面推进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加快推进数智产业项目建设等。做优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做大数字经济新生态，打造高品质数字经济园区，在全市形成“一核多园”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构筑多元的数字服务体系，建设全市数字经济云服务平台，提高企业数字服务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加强监管，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打造创新为民数字政府。加快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化机关运行体系，打造一体化综合指挥体系，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推动“数字治城”，提高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以“优政”为目标，在政府内部，基于“山东通”平台应用，实现高效机关运行体系+综合指挥体系。在企业服务层面，基于“惠企通”平台应用，实现“一站式”便民惠企服务。在服务公众层面，基于“爱山东”平台应用，实现“一次办好”“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持续优化提升数字社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依托创新技术，全面推进数字服务、数字生活、数字空间

建设，创造普惠均等、温暖贴心、和谐宜居的数字公共服务，提高城市生活品质，助力打造文化济宁、美丽济宁、幸福济宁。完善普惠均等的数字服务，深化智慧人社，完善智慧养老，推进智慧救助。打造温暖贴心的数字生活，强化智慧教育，普及智慧医疗，推动智慧出行，推进智慧文旅。构筑和谐宜居的数字空间，完善智慧社区，深化数字乡村，持续擦亮济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品牌。

筑牢夯实完善数字基建。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赋能平台建设，补齐短板、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夯实数字济宁底座。打造全方位数字赋能平台，建设“汇管用评”的数据中台、集约共享的业务中台、多端一体的移动中台、万物互联的感知中台、虚拟融合的时空中台、开源智能的算法中台、“云网端数”的安全中台。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大力推进以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布局算力中心，特别是打造制造业算力中心，建立“产业大脑”，为制造业产业链提供算力支撑，推进新型工业化。

培育活力安全数字生态。以全面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济宁建设各领域全方面的流程再造、规则重构，创造新体系，保障数字经济济宁建设高质量发展。创新运营体系，打造合作共赢的运营生态，分级分类开放共享数字化应用场景，优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完善标准体系，制定数字经济运行标准体系，加强效能评估，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反馈评估体系。强化安全体系，健全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增强专业化安全防护能力，最大效能提升安全防护能力。（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汪彭珊

“十五五”时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刻认识到“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

坚持党建引领，凝聚乡村振兴组织合力。党建是乡村振兴的引擎。要压实责任链条，落实压实各级乡村振兴第一责任人责任，以钉钉子精神层层抓好落实，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把“软弱班子”打造成“振兴头雁”。要坚持规划先行，强化“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理念，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科学编制完善乡村建设规划、城乡融合发展规划。要激活主体力量，汇聚“万众一心加油干”的力量，提升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广泛发动、引导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形成政府精心谋、扎实做，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主动配合的工作局面。

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乡村振兴核心动力。农业产业要靠科技创新驱动。要健全产业链条，塑造特色优势，坚持“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实施品牌建设，推进农产品

■贾磊

近年来，任城区积极探索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之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挖潜在文旅资源，推动文旅项目建设，深化文旅融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围绕“行通大运，和合南北”的品牌定位，打造“运河文化特色区”，“文旅+”融合模式不断创新，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文化与旅游相互促进。

三类文化资源形成差异化优势。任城区文化资源呈现“历史为根，民俗为魂，运河为脉”的特征。历史文化：以太白楼为核心，保留了东大寺、铁塔寺、河道总督署遗址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明清时期漕运历史的活标本。民俗非遗：成功推动葫芦雕刻、剪纸、面塑等非遗项目走进商圈、景区，通过建设特色非遗工坊入选“非遗在社区”全省试点，有效实现了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运河文化：作为京杭大运河核心区，保留了河道总督署遗址，“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被评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还原了明清时期运河码头的繁华景象。完成运河总督署展示馆等场景场景建设，通过3D影片《砥柱中原 转漕上国》、VR设备还原漕运历史，让游

生产和初加工、精加工协同发展。要创新发展模式，提升竞争实力，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牵头组织产业化联合体，以项目支撑带动产业全面提升。要拓展业态价值，培育增收亮点。通过农业功能的横向拓展，加快培育生态旅游、休闲康养、农村电商、体验农业等“农业×”多业态模式，结合民俗文化、特色手工等开发乡村数字文化产品和文化市集，提升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全方位价值。

精准施策赋能，释放乡村振兴内生活力。提高惠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让农村资源“活”起来、发展动能“强”起来。要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资源资产，进一步完善推进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标准化建设，探索农村产权权能拓展路径，打造数字化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要健全要素支撑体系建设，强化资源保障，积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加强涉农资金整合，深化政企企合作，推动农业农村、自然资源、

客“沉浸式”感受运河文化。

一核两翼产业格局初步成型。任城区依托资源优势，形成“以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民俗非遗在社区和‘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为两翼”的产业布局。核心区：作为京杭大运河核心区，重点对运河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开发，推进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的建成开放，完成对东大寺、铁塔寺等标志性建筑的修缮工作，增加运河总督署展示馆等数字场景建设。民俗翼：推动非遗项目进驻“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津多里商圈，入选省“非遗在社区”试点县，实现“非遗+商业”“非遗+旅游”双赋能。运河翼：打造“运河记忆”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国投麴街等消费集聚区，增添了龙船巡游、相声船、夜间灯光秀等业态。

三种融合模式探索文旅互动。“文化+景区”：依托运河打造的特色文旅体验带，“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还原了明清时期运河码头的繁华景象，游客

水秀、交运等涉农资金向乡村建设集聚倾斜。要完善人才引育政策，夯实智力根基，加强“新农人”全链条培育，大力培养乡村管理人才、运营人才、农业生产经营人才等，对农业科研人才、创业人才给予土地、资金、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助力各类人才干事创业。

提升治理效能，展现乡村振兴和美魅力。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要聚焦“大美”生态，提升环境品质，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厕所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含金量”“含绿量”。要深耕“人文”底蕴，培育文明乡风，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充分利用好文化服务中、文化广场等资源，深化移风易俗行动，建设文明乡风。要深化“善治”融合，擦亮幸福底色，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群众由被动管理向主动提升转变，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作者单位：中共邹城市委党校）

走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可乘坐画舫泛舟运河漫游。“文化+体育”：围绕“大运河国家公园战略”，推出“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济宁站），承办2025年山东省体操锦标赛、2025年济宁马拉松等赛事，其中济宁马拉松赛道串联太白湖、古运河、济宁港航智慧港口等地标，吸引2万余名选手参赛。“文化+科技”：引入《长安三万里》VR大空间项目，河道总督署展示馆通过3D影片《砥柱中原 转漕上国》、VR设备还原漕运历史，科技赋能让传统文化“潮起来”。

当前，任城区正通过“活化文化资源、深化文旅融合、打造知名品牌、完善配套服务、培养文旅人才”等系统措施，促进文化产业从“资源驱动型”向“价值驱动型”转变，实现“文化传承有载体、文旅发展有内涵、经济增长有动力”的目标。今后，任城区还会加大力度，不断深化文旅融合，将“文化基因”注入旅游全链条，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党校）